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西方译者译介行为中的解读

——以巴恩斯通英译《毛泽东诗词》为例

马婷婷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 毛泽东诗词以极高的文学造诣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进行了艺术化地再现,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就译本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解读和传译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之所在。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域下,基于巴恩斯通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通过社会和语言两个层次、译外和译内两种行为来分析其译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解读和传译,进而得出结论:巴恩斯通的身份特征、学术素养、翻译经历和读者意识,以及他在译文中所使用的归化异化相结合、直译和意译相搭配的翻译策略方法,忠实传达出了意象,塑造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渲染了诗词的意境,以上因素是其译本获得广泛传播和学界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也是新时代的中国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时代议题下可以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译介行为;巴恩斯通;毛泽东诗词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4) 01-0022-6

DOI: 10.12424/HA.2024.004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202401-022.html>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王炳林、房正,2016: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革命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应该永远铭记的伟大历史。毛泽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写进了诗词中,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用豪迈有力、大气磅礴的文字展现得酣畅淋漓。

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活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且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众多学者和翻译家纷纷复译的对象。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将《七律·长征》进行了意译,收录于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这被看作是西方国家对毛泽东诗词英译活动开始的起点(李正栓,王心,2019: 9)。综观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情况,

以英美两国翻译毛泽东作品的译本居多,并超过了国内译本的数量。同时,西方关于毛泽东诗词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各国诗人、翻译家、汉学家等群体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兴趣(李琳,陈琳,2018: 15)。

美国诗人、学者、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与华裔学者郭清波(Ko Ching-po)合作翻译的《毛泽东诗词》(*The Poems of Mao Tse-tung*)于1972年3月和9月分别由纽约哈珀与罗(Harper and Row)联合出版公司以及班坦(Bantam)公司出版。该译本也是英语世界影响较大、传播范围较广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之一,对于西方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同译者行为不尽相通,所传意旨会有差别,所呈形象也会有异”(李正栓、张丹,2021: 83)。“译者”指的是意志体的译者“人”,“行为”指的是连续的、有规律可循的行动(周领顺,2014: 3)。在译者群体中,西方译者译介中国领导人诗词的行为尤其值得关注。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认为“译者行为研究主要从译者留下的意志痕迹,分析译者有意、无意或潜意识行为背后的动因”(周领顺,2014: 4),

作者简介: 马婷婷,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他指出,译者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两个属性,对应了其身份行为分为内部社会性(言内行为)和外部社会化(言外行为)两个方面,因此翻译批评也有了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视野(周领顺,2019:122),这对于分析社会化环境下译者的译介行为及其译文背后的体现的行为规律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要求,因此,鉴于巴恩斯通译本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通过研究巴恩斯通译文中毛泽东诗词的呈现,总结其翻译活动中翻译内和翻译外的影响因素以及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的一般规律,结合文化因素与社会因素对其译本进行批评,进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以巴恩斯通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知中的解读,这一方面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和革命形象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意义;另一方面,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本身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二、毛泽东诗词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毛泽东自1910年起至1975年,在65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一百多首诗词。这些诗词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受人民喜爱,同时也被译为多国语言在世界范围传播。毛泽东诗词除了具备在文学艺术上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词中洋溢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毛泽东在书写中国革命困难重重、百折千回的历程,而中国共产党人却始终不忘初心、不断抗争,带领中国人民迈开步伐“从头越”的壮志雄心;“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决心的赞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毛泽东赞扬中国人民敢于牺牲的勇气、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以及战天斗地的必胜信念;“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是毛泽东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彰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度的自信和伟岸的胸怀。

这些气韵和内涵的彰显使毛泽东的诗词成为经典,如今也在新的时代激励和鼓舞着所有中国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踔厉奋发。在西方语境下,读懂、译好毛泽东诗词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对于帮助传播中华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巴恩斯通译外行为中的解读

“译外行为是译者的社会性行为,处于翻译的高级层,译者是语言人和社会人,其行为部分表现为译者参与社会活动时的普通人之为,包括译者使其翻译作品进入流通领域并拥有读者的行为。”(周领顺,2013:73)巴恩斯通在社会活动层面所习得的能力、获得的履历以及人生经历,如译者身份、学术素养、翻译思想和读者意识等等,共同决定了其毛诗译本中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解读。

(一) 巴恩斯通的译者身份和学术素养

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是美国诗人、学者、翻译家。首先,他具有优越的学术背景。他出生于美国缅因州,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在西方诗歌传统中浸润的同时,他也曾在中国居住和任教,这使他有幸接触了中国古典诗词,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为他在大学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他深谙中华文化,非常熟悉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也更能理解毛泽东诗词中所描绘的革命画卷和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其次,巴恩斯通拥有丰富且成熟的翻译实践经验。巴恩斯通曾翻译过中外多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在翻译领域成果丰硕。最重要的是,巴恩斯通诗人兼译者的身份成为了他在语言上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将毛泽东诗词的气韵如临画般临摹得更加“神似”。最后,巴恩斯通曾在伦敦大学学习,期间,他受毛泽东诗词英译者之一英国诗人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的影响,对毛泽东诗词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决定翻译毛泽东诗词(Barnstone,1999:8),而他本人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敬仰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赞美,也使得该译本获得了成功,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二) 巴恩斯通的翻译思想和读者意识

巴恩斯通沿袭了以庞德(Ezra Pound)为代表的意象派新诗风,又受到其自由诗体译诗传统的影响,因此借鉴了汉诗注重意象营造的手法,“重视译诗中异质文化意象的凸显与传递”(侯奇焜,2023:124),重视突出诗歌的画面感。他善于抓住中国诗歌中的代表性意象,尽可能忠实地传递信息,从而突出译出其整体意境的美感,力争最大限度地传递汉语诗歌中的诗意。

巴恩斯通兼具诗人和译者的身份,因此,他在把握中西诗歌的特点方面具有优势,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再加上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韦利(Arthur Waley)

对他翻译思想的影响，他的译文既适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域，也能够较准确把握毛泽东诗歌中的意象，再现毛诗风格，传译出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精神，因而在中国也备受学界瞩目。

四、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巴恩斯通译内行为中的解读

翻译内行为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翻译的语言属性。

“‘语言性’是译者的基本属性，是翻译活动的基本特征，也是翻译批评的传统关照。”（李正栓、张丹，2023: 17）。翻译活动的基础是译者输出的语言文字，即语码或意义符号的转换活动，如词、句、段等形式转换，修辞、音韵、节律等技巧转换。通过转换，译者在译文中传达原文中的人物形象、意境、风格、内涵、文化等。对于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来说，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革命气概和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等信息的思考、解读和传达，是决定译文质量的关键，巴恩斯通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选择，也是分析其译内行为的重要标准。本文在后面的案例和论证中，将用巴译来代指巴恩斯通的译文。

（一）巴译中的意境渲染

意境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注重意境的营造，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标准。中国古典诗词往往用意象和意象组合来营造意境，毛泽东诗词对意境的渲染也是其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沁园春·雪》创作于1936年2月，毛泽东在词中描写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多娇，历数纵论历代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歌颂了当今时代革命英雄和领导人前无古人的胸襟和才能，并且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的信念和抱负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空前的伟大业绩。整首词激昂豪迈，有着气吞山河之势，尤其是词的上阕用雄奇壮阔的北国雪景做背景和铺垫，更加渲染了词的意境。以其中的典型的词句翻译为例：

原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毛泽东，1986: 61）

巴译：“The scene is the north lands.

Thousand of li sealed in ice,

ten thousand li in blowing snow.

From the Long Wall I gaze inside and beyond

and see only vast tundra.

Up and down the Yellow River

the gurgling water is frozen.

Mountains dance like silver snakes,

hills gallop like wax bright elephants

trying to climb over the sky.”（Barnstone.W, Chingpok, 1972:86）

原词开头使用了三组四字格，巴恩斯通在译文中也采用了简单的句型和词汇意象组合，读起来非常平淡，虽然做到了与原文的“形似”，但汉语四字格中气势的再现却被打折了折扣。原文中的“北国”在汉语的意境里面不仅指的是地面维度的北方的土地，还包括了气候和人文，因此很容易让人联系到猎猎北风和皑皑白雪，还有伟岸的身躯和坚毅的品质。而巴恩斯通译文中的“north lands”只译出了字面意思，更多的文化要素以及它所涵盖的广阔画面却远远没有传达出来。随后，“sealed in ice”是对“冰封”既形象又传神的处理，生动地完成了该句对意境的渲染。但用“blowing snow”来处理“雪飘”则丧失了鹅毛大雪飘落时灵动的美感。

紧接着的四句，原词用了“内外”和“上下”两对相对的方位词、“惟余”和“顿失”的对仗，以及“莽莽”和“滔滔”这对叠词，极力渲染辽阔壮美的雪后北国景象。叠词的使用大约开始于《诗经》时期，并为之后的诗词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汉语中的叠词有助于增添诗词的音韵美、形式美、意蕴美，在音、形、义上都起到了增强表达效果、渲染诗词意境的作用。原诗中的“莽莽”和“滔滔”都是以大手笔来描绘大场景的叠词，增强意境感染力的同时，读音的重叠又给诗歌增添了诵读时的音律感。

在英译中，巴恩斯通没有采用同汉语相同的句型架构和工整的形式，也没有使用英语的叠词来进行对应：两个英文的简单句分别采用“S+V+O”（主谓宾）和“S+V+P”（主系表）结构，但都同样把表示方位的短语“from the Long Wall”和“up and down the Yellow River”放在最前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强气势的作用，但与汉语利用形式对仗工整所表现出的效果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see only vast tundra”和“gurgling water is frozen”只是对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长城和冰冻的黄河水的客观描述，体现不出毛泽东用“惟余莽莽”和“顿失滔滔”体现出的对祖国大好河山壮雪后奇美景象的赞叹与热爱，感情色彩弱化了很多，而其中所采用的夸张的修辞手段也没有译出来。语言层面上来说，这是英汉两种语言的巨大

差异引起的。傅雷(2005)在1951年9月,《〈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讲道:“译本与原作,文字既不侔,规则又大异。各种文字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

(2005: 1)现代汉语的英译已是不易,更何况是古诗词的英译。“英译汉语古诗不可能完整地再现原文的外形‘美’。那么抓住原诗最值得表现的‘美’点并尽力表现它就成为成功翻译这首诗的关键。”(穆诗雄, 2004: 154)。因此,巴恩斯通作为译者的语言内行为表现为舍“形美”而取“神美”,舍去汉语语言形式和句法,仅明确传达原诗的表达重点,这样可以在现有的语言条件下尽可能准确地临摹原文的背景画面,渲染原文的语境色彩,烘托出中国共产党人豪迈的革命胸怀和不凡的革命。

巴恩斯通对“银蛇”和“蜡象”的翻译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忠实于原文,还原意象。在“舞”和“驰”这两个动词的翻译上,诗人译者巴恩斯通同样解读出了诗人革命家毛泽东在看到眼前这一派北国风光之时的喜悦与赞叹,他也在译文中同样用了两个富有极强的动感的动词“dance”和“gallop”,来传达原诗中的神采。这一句的“天公”在西方语境下并不好对应,因此作者采用归化策略,处理为分词结构的“trying to climb over the sky”,承接和对应前面“mountains”和“hills”的欢腾是热烈的,是直冲天际的,是无畏无惧的,为下文诗人站在辽阔雪景前豪迈地纵论古今渲染了大片相宜的背景色彩。

(二) 巴译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塑造

毛泽东在诗词中记录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书写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敢为人先、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壮怀激烈的革命人生,诗词中所表现出来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气魄、胆识、智慧,以及精神风貌和品格风范,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在巴恩斯通的毛诗译本中,同样可以看到他忠诚于原文的对中国共产党人形象的塑造。

《七律·长征》(毛泽东, 1986: 51)为毛泽东1935年10月所作,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岷山,中国工农红军这场举世闻名的长征已经走过了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回顾一年的历程,回忆党率领军队战胜的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回忆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重重考验,看到这支生机勃勃的队伍依然顽强不屈、一往无前,他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并满怀喜悦地展望即将到来的胜利,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

豪情和气概挥笔写下了最能代表“长征精神”的壮丽诗篇。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提出了“长征精神”,总结出“长征精神”中包含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必胜的信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基本特征。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胡锦涛进一步阐释了其思想内涵,认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胡锦涛, 2006: 1)。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习近平又进一步诠释了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指出:“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习近平, 2016: 002)。可见,“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一部分,在和平年代得到了赓续、延展和深化。《七律·长征》的巴译本 *The Long March* 如下:

原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 1986: 51)

巴译:“The Red Army is not afraid of hardship on the march,

the long march.

Ten thousand waters and a thousand mountains are nothing.

The Five Sierras meander like small waves,

the summits of Wumeng pour on the plain like balls of clay.

Cliffs under clouds are warm and washed below by the

River Gold Sand.

Iron chains are cold, reaching over the Tatu River.

The far snows of Minshan only make us happy

and when the army pushes through, we all laugh.

(Barnstone.W, Chingpok, 1972:77)”

巴恩斯通对中国社会的在翻译这首诗的时候,也着力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长征精神”译出来。译文第一句在“the long march”后紧接着用“the long march”对其加以强调,这是与原文完全不同的句式表达,但传达效果上却殊途同归,体现了长征征途的遥远与时间的漫长,解释了前面的“hardship”的原因,避免给不熟悉长征背景的西方读者带来困惑,

同时也反衬出红军的“不怕”，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面对磨难却毫不退缩的革命精神形象便跃然纸上。接下来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两句，巴恩斯通在忠实于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将原词中的夸张和暗喻转化为译文中的“明喻”，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认知，此外“small waves”和“balls of clay”这两个鲜明的喻体也极言红军的大无畏精神，即使脚下是再险再恶的山，红军战士能用顽强豪迈的英雄气概踏过去。

诗的最后两句，巴恩斯通将原诗中的“喜”与“开颜”用了直译的方法直抒胸臆，将三军将士战胜困难之后的喜悦表达出来，刻画出自强不息的革命斗争精神和“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外，原诗中的“千里雪”的数字意象被泛化为“far snow”，“三军”中“三”也为了避免目的语读者的困扰而省去不译。而原诗中的“过后”在译文中反而被具体化为“push through”，有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诗，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可见，巴恩斯通在翻译毛诗时，译者的主体意识体现得非常明确，译者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文的质量和接受度。

五、结论

毛泽东的诗词除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外，还蕴含着崇高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描绘出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光辉的革命历程画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为人先、英勇无畏、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和必胜的革命信念。毛泽东领袖兼诗人的身份，使得他的诗词作品在国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也被中外译者翻译为多国文字，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艺术财富。

就西方译者的译介来说，毛泽东诗词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传译内容的精髓，直接决定着毛泽东诗词译介效果。译者行为批评视将译者的译介行为和译者的文本联系起来，从“翻译外”和“翻译内”两个视角在社会层面和语言层面分析译者的译介活动，进而评价译介质量和效果。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译者之一，他与华裔译者郭清波（Ko Ching-po）合作翻译的《毛泽东诗词》（*The Poems of Mao Tse-tung*）为毛泽东诗词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的译者身份、学术素养、翻译经验和读者意识等译外行为，为他了解毛泽东诗词写作的时代背

景、历史语境、意象解读等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为他在译本中正确有效传译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以及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搭配使用，并采用“逐词对译”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做到对原文忠实，凸显中国诗歌中的代表性意象，同时沿用目标语的诗歌传统，利用适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形式最大限度地传递汉语诗歌中的诗意，进而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的丰富内涵传达出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明确要求，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是帮助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重要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搭建起中西有效沟通的渠道，需要从文化和哲学层面入手，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以中西共通的价值理念进行对话交流，从而消弭分歧、增进理解。在其毛诗译本中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解读，再次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走向胜利、实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是赓续传承红色血脉的基因与精神密码。同时，也说明：成功的译介活动可以构筑起中西方共通、共情和共鸣的桥梁，有助于“文明互鉴”，弘扬全人类的价值立场，从而完善和发展现有的人类文明话语体系。这也为新时代的中国如何在立足文化自信、坚守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提供了方法借鉴。

参考文献

- [1] Barnstone, W. Chingpok. *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inc., 1972.
- [2] 侯奇焜，巴恩斯通毛泽东诗词英译原则探微[J]. 外国语言与文化，2023，7（3）：122-130.
- [3]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6. 10. 23（1）.
- [4] 李琳，陈琳．毛泽东诗词英译与意识形态[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25（4）：10-18，159.
- [5] 李正栓，王心．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综述[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26（6）：9-18，155.
- [6] 李正栓，张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译者行为研究[J]. 外语教学，2021，42（3）：82-87.
- [7] 李正栓，张丹．毛泽东诗词译者行为研究[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2）：14-21.
- [8] 毛泽东．毛泽东诗词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 穆诗雄.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4.

[10] 怒安. 傅雷谈翻译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11] 王炳林, 房正. 关于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 (03): 4-15, 155.

[12]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3. 12. 27 (2).

[13] 习近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 10. 22 (002).

[14]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问题 [J]. 外国语文 (双月刊), 2019, 35 (5): 118-123.

[15]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 路径探索 [M]. 商务印书馆, 2014.

[16]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 [J]. 外译研究, 2013 (6): 72-76.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CPC in Western Translators'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Translated by Barnstone

Ma Tingting

Abstract: Mao Zedong's poems have artistically reproduced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CP with high literary attainments in literature, and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s far as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of the translated texts is concerne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CP is the key factor to their suc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 this paper analyses Barnston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CP in *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his translation work, at two levels, both the social and the linguistic ones, as well as two behaviors, both extra-translation and intra-transl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Barnstone's identity,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experience of translation, and readership awareness, as well as his combination use of both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nd of both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 to convey the images, to make a portray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o express the poetic mood,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wide dissemination and great influence of his translation work in the academic fields, and are also the paths to learn from, in this new era, under the topic of the strengthening China's influe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CPC; translator's behavior; barnstone; poems of Mao Zedong